

同窗情十载 风雨五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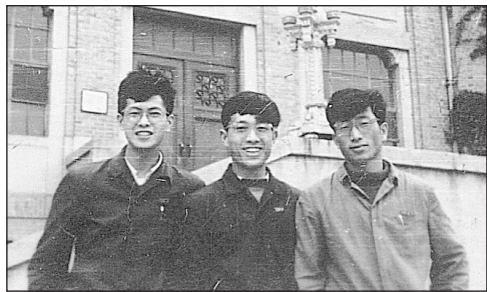
——我和万学文同学的故事

○程声通（1964土木）

初识清华园 十载同窗情

第一次见到万学文，是1958年9月下旬新生报到那一天。在土木系的迎新点，迎新的老师一看我的报到证，就指着一个台子说：“你分在土四四班，在那边。”只听几个女生喊道：“咱们班的！咱们班的！”后来知道，她们中有李雅丽和赵晏，好像还有焦玉文，她们是北京籍的新生，昨天提前报到，以便为外地新生服务，这也是清华的一个传统。

从上海出发时，有两个亲戚与我同行，和我一起搭乘校车进了清华园，他们的随车行李需要到西院校卫队办理出门手续。我初来乍到，不知东南西北，有点犯难。就在此时，一个个子高挑、面庞清瘦、架着眼镜的同学走过来说：“我替你办吧，我也是土四四的。”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清华同学，左起：万学文、程声通、罗维昆

他就走了。约莫过了20分钟，他递给我一张出门条。当时，我只觉得心里暖呼呼的，竟忘了问他的姓名，心想，他肯定也是北京籍学生。第二天班上集合，大家自报家门，才知道他叫万学文，来自江西南昌，家住筷子巷。

十年以后的1968年春，我们这批“修正主义苗子”被处理出校门。因为在学校里早就无所事事，万学文在春节前就已经回到南昌老家，在那里联系了工作单位。他的离校手续就由我在北京一手操办，也算是我对他十年前“迎新”的回报吧。

六年练真功 毕业结硕果

大学六年，年年搬宿舍，我至少有两次与万学文成为室友，他思维敏捷，聪明过人。刚入学时，我当过数学课代表，高等数学课留的习题很多，其中不乏难题。每次都不见他花多少时间，早早就把作业交来了。大一下学期测量实习，我们在同一组。那时候，计算尺是先进的计算工具，算盘也不可缺。无论是拉算尺，还是拨算盘，他的答案都要比我们快出一步。

万学文平时说话有些许口吃，但语言能力却很出众。他能够背诵很多古诗词，在适当场合就能脱口而出；在大学期间，他不仅进修了英语二外，还自学了德语，

□ 值年园地

都有不俗的水平。有一年的新年联欢会上，他和竺中天联袂表演节目，万扮演火星来客，操着自编的火星语言，虽有口吃但仍不失流利地向我们这些地球人致辞；竺扮演翻译，no、no、no地将万的致辞翻译成普通话，两个人惟妙惟肖的搭档，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大学六年级毕业设计，万学文、崔志征、贺占魁、崔文荣和我同组，在许保玖、周莲溪老师的指导下研究高浊度水处理。我们联合攻关，取得了优良成绩。

劳动与革命 好心办傻事

大学毕业以后，我们俩同时考取清华的研究生，万学文师从许保玖教授，专攻给水处理；我则师从陶葆楷教授，主攻工业废水处理。在研究生一年级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曾经使万学文和我非常被动。

大学毕业前夕，北京市应届大专毕业生，在工人体育场聆听周恩来总理题为“劳动与革命”的讲话。他教导我们：不要忘记1500万同龄人，要与劳动人民相结合，走革命的道路。毕业以后，很多同学走上了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他们有的参加了农村的“四清”运动，有的投入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有的走进了解放军这所大学。他们从四面八方寄来的信件充满了新生活的气息，生活在清华园里的万学文和我深受鼓舞，就将这些信件加以汇编，借来钢板和油印机，在课余时间刻板、油印、装订成册，由冯彝谦设计封面，然后邮寄给全国各地的学友。为了纪念周总理的讲话，小册子就定名为《劳动与革命》。从后来大家的来信看，我们的用心得到了同学们的肯定。

正在我们为自己的作为感到得意时，土建系党总支副书记沈恒滋老师代表学校党委和我们俩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沈老师问我们，是不是油印了一份材料寄到了全国各地？我们如实汇报了情况。沈老师肯定了我们的动机，但接着问我们：“你们知道不知道自己犯了错误？”我们说不知道。沈老师就指出我们至少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你们将全班同学的工作地点刻画在一张中国地图上，泄漏了国家机密，帝、修、反可以据此推测出我国的经济布局，这张图要是落在他们手上，就会成为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第二，小册子中所反映的基层情况都能保证属实吗？有的农民说他们那里的干部专横跋扈，就像“小台湾”，这不是在丑化社会主义，给阶级敌人提供炮弹吗？听了沈老师的分析，我们俩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要知道，在那种年代，不管什么事，只要和“阶级斗争”挂上勾，小事会变大事，没事也会有事。最后，沈老师代表学校党委要求我们，在一个月内将寄出的油印材料全部收回，交到党委组织部。我们俩当天就给大家写信，请大家千万将小册子寄回。事后收到了返回的二十多份材料，我们如数交给了党委。不久，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使清华党委自顾不暇，这件事也渐渐被人们淡忘了。

“文革”荒唐事 长沙成囚徒

1965年，到京郊延庆县参加“四清”，我在张山营公社搞水利，万在靳家堡公社抓革命，差不多有一年没有见面。“文革”开始后，我们回到学校。当时，学校里一片“红色恐怖”。一天晚上，红卫兵又出

动了，排着队在外面喊口号，不知道又要去抄谁的家。这时，万学文推门进来，悄悄地让我把书架上那些精装外文书收起来，免得红卫兵见了说不清，当成“四旧”给烧了。可能因为红卫兵的斗争对象太多，无暇顾及我们这些“修正主义苗子”，他们始终没有光顾三号楼。

一天深夜，和我同屋住的罗维昆从外面回来把我叫醒，说是有两张去长沙的火车票，问我愿不愿意出去串连？那是1967年年初，“文化大革命”半死不活，我在北京呆着百无聊赖，正想出去换换空气。可到长沙当天我就病倒了，发高烧。第三或第四天深夜，听到砰砰嘭嘭敲门声，我迷迷糊糊打开房门，只见几个荷枪的士兵站在门口，一个军官对我们说：“穿好衣服，跟我走。”我跟着他来到一个办公室，发现万学文也在场，后来知道，他比我先来一天。那个军官说：中央文革小组已经作出决定，湖南造反派“湘江风雷”是反动组织，他们的头目都已经被抓。你们从北京来串连，要审查你们与“湘江风雷”的关系。就这样，我们稀里糊涂地成了阶下囚。

我们一同从北京来了约莫七八个人，罗、万和我被关在长沙工程兵学院的一个房间，在被囚禁的几天里，行动上受到限制，每天让我们写交代，我当然只好交白卷了。负责看管的士兵和军官对待我们还算友善，没有什么过激行为。后来我才知道，我的那些同伴们写过一张大字报《炮打龙书金》。龙当时是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是老红军。过了几天，那个军官对我们说，你们几位可以走了。鉴于形势，这件事的个中原委当时也不好多问。于是，我和罗

维昆乘车北上，返回学校。万乘车向东，回南昌老家过春节去了。

几个月以后，我们又去长沙工程兵学院，希望弄清楚当时扣留我们的原因和最后的结论，接待人员说，那件事已经过去，他们没有留什么档案，也不存在平反问题。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十年寒窗苦 竟成处理品

1967年下半年，许多1966届和1967届的毕业生贴出大字报，要求“4600部队支左”，意思是赶紧分配工作，好拿取每月46元的工资。我们这些老童生最惨，万和我的分配方案都是贵州基建工程兵部队。基建工程兵是由从事三线建设的建筑单位改编的，因改编还没有完成，所以还不能接收我们。在我们苦苦要求下，将我们退回教育部重新分配。当时的教育部处在瘫痪状态，军代表允许我们自找门路。

“文革”期间，生产建设处于停顿状态，几乎找不到一个接收单位。后来，给二班留校的叶书明师兄在一次专业交流会上，为我找到了一机部第八设计院。在南昌的万学文是“地头蛇”，找个接收单位不像我这么难。于是，我就去了设计院，万学文则回到老家南昌。我们离开学校时，是按本科生分配的，但是工资只拿本科毕业生之百分之九十，真是有苦难言。

从1958年进校到1968年离校，万学文和我真正是十年同窗。分配工作以后，我们一南一北，交往渐渐少了。但是不久，命运又给了我们相见的机会。

天工能开物 干校献体力

1969年4月，随着“五七干校好”

□ 值年园地

最高指示的发表，我被送到了江西奉新县境内的一机部五七干校，除了整地、插秧、耘禾、收割、砍柴这些基本农活以外，干校分配我干的第一件专职工作是“榨油”。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土法榨油还在这里沿用，是个超强且危险的体力活，带领我们的老师傅被轧断了好几根手指头。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的生产方法，我们到南昌榨油厂去参观。

到了南昌，自然要去见见老同学。那是1969年6月，就在筷子巷，我见到了分别一年多的万学文。他们一家人住在一栋带天井的老式房子里，他那时在南昌自来水厂工作，主持建造了一座无阀滤池，滤池模型曾经出现在当年南昌市国庆节游行队伍中。他听说我在干校里榨油，就笑称我是“天工开物”里的人物。离开南昌时，他还送给我一张草席。

1969年下半年，我从榨油组转到了铁工组。此前，榨油组已经用上了电力驱动的螺旋压榨机，劳动条件和强度都大大改善。但是铁工组却又是另一幅“天工开物”的景象。开始，我光着膀子，系个大围裙跟师傅学手艺，时而拉着风箱，时而随着师傅小锤的节奏抡起16磅重的大铁锤，师傅指向哪里，我就打到哪里。为了买原料，我经常到南昌市一机部所属工厂，因此，就有较多机会见到老同学。

师生共甘苦 南昌有奇遇

1969年秋，万学文对我说，清华的几位老师到了鲤鱼洲干校，现正在南昌郊区测量地形，为干校架电线。于是，我们骑上自行车，大约一个多小时路程，在一个破庙里见到了老师们，记得有王占生、

蒋展鹏、徐鼎文、胡纪萃、张汉升等老师。见面时，除了介绍干校的情况，老师们谈得最多的是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中苏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忧国忧民，溢于言表。

我在南昌有一次奇遇，若非亲身经历，真是难以置信。1970年的某一天，我去南昌办事。到了南昌，自然要去看看万学文。我在公共汽车站几个站牌前找了许多，也没有发现“筷子巷”这个地名。向身边的当地人一打听才知道此地拆迁，住户们都已搬走。正在我着急时，只听得身后传来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声音：“程声通，是不是找万学文家？”我回头一看，许保玖先生就站在我身后。我真是又惊又喜，怎么也想不到，在这里与当年的导师不期而遇。许先生告诉我，他全家到了鲤鱼洲干校，他本人被抽调来支援江西维尼纶厂建设，住在南昌市里，最近去过万学文新搬的家。于是我跟着许先生来到万的新家。师生三人，在这种特殊场合、以这种特殊方式见面，真有喜从天降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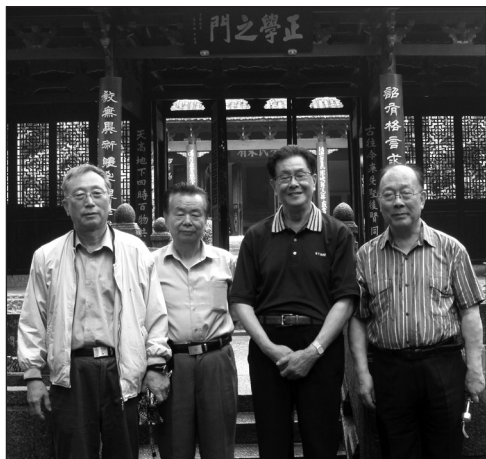
许先生是我国卫生工程界从美国归来的两位博士之一，50年代初冲破重重障碍回到祖国，现在全家落魄到了五七干校，我们都感到不平，想用一些言语来宽慰恩师，但彼此又不愿意将事情点破，生怕破坏了师生见面带来的好心情。这一年，万学文好像已经调到南昌市规划设计院。

事业重开始 南北各努力

我在干校“深造”一年多，1971年回到已从北京迁到湖南湘潭的设计院。从去干校开始，我们家就一分为三了，1972年第二个孩子出生，家庭的重担几乎都压

在妻子身上。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我想，这也许是我争取回京、实现家庭团圆的最好时机，但又怕长期学业荒疏而落选。这时，老师们的鼓励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对我说，现在学校需要人，只要你报考，我们就要。当然，这是鼓励的话，要是真考砸了，老师们也爱莫能助。好在天从人愿，1978年10月，我又回到了阔别十年的清华园，当起了真正的老童生。这一年，我39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

在得知研究生招生的消息以后，万学文和我有过交流，他也流露出报考的想法，但是让我“劝阻”了。我对他说，你与我不同，你家庭、事业都在南昌，为什么要搞个“妻离子散”？我的意见对于他最后的决定可能起到了作用。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也许比较短见。万学文天资聪颖、感悟力强，当年如果破釜沉舟来清华，在学术上肯定会有更多成就。当然，他在南昌干得也很出色，事业和仕途均有斩获，家庭也很幸福，也不能说我当年的意见完



2012年6月，万学文邀请研究生同学同游庐山。左起：罗维昆、王昌明、万学文、程声通

全不对。

1981年，国务院环保办在清华举办第一届“环境系统工程研讨班”，所用的教材是傅国伟教授领着我们几位研究生编写的《水污染控制系统规划》等。当时纸张和印刷力量都很紧张，赶在研讨班开办之前印刷、出版实在困难，想到的第一个求助对象就是万学文，他在江西为我们联系了最好的印刷厂，并作为紧急任务安排生产，万本人则义务承担了清样的校对。

大约在80年代的中后期，王占生老师从南昌出差回京，曾对我说，万学文要当副市长了。事后确认这不是真的，但他在市政工程和城市规划方面的确取得了很多成绩，为南昌市的建设作出了很多贡献，不久就晋升为高级工程师和高级规划师。

夕阳无限好 建业再立功

进入新世纪，我们都相继退休。万学文却在2002年年底，出任江西省农工民主党主任委员。后来在2003年初的江西省人代会上，当选为省人大副主任；在同年3月，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为国家大事操心，2008年退休以后，仍在为江西省的教育文化事业操心。

万学文在工作上很出色，在生活上也很有情趣。他常年坚持游泳，锻炼身体。他很早就学会驾驶汽车，节假日有时还会驾车远游。有一年春节，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说：“我们全家自驾去黄山游玩，现在就坐在你们老家屯溪老街第一楼里，给我们介绍几样美食吧。”步入古稀以后，互联网成了我们最常用的交流手段。

我祝愿万学文在服务人民的同时，享受生活，欢度晚年。